

※序跋選錄※

《張壽林著作集》校訂跋

楊晉龍*

一、前言：學術的服務與引領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由「中國古典文學」、「中國現代文學」、「中國哲學」、「中西比較哲學」和「經學文獻」等五個學術研究方向共同組成，研究範圍包括了中國的「文學」、「哲學」與「經學」等三大基本學科。長期以來，各研究方向的研究者，基於研究需要及學術服務的熱忱，均曾花費許多心力在相關文獻的蒐集、整理與校訂等的工作上，這些成果除中國文哲研究所出版的《古籍整理叢刊》諸書外¹，諸如：彭小妍小姐(1952-)主編的《楊逵全集》²、李明輝先生(1953-)與黃俊傑先生(1946-)等合編的《李春生著作集》³，莫不對相關的研究者，提供了更為方便可靠的研究文獻，同時也達到引發同行注意，進而共同參與研究的效果，蒐集整理點校《張壽林著作集》等一類著作，就是在相同理由、原則與意義下的表現。

蒐集整理張壽林(1907-?)等一類大陸民國時期非主流學者的著作，除前述研究需要與提供學界參考及引發相關研究風潮等等功能之外，其實另有經學史與研究方法意義的學術理由。故下文進行的程序，將首先簡略申說編纂此類著作集的經學史意義，然後再討論點校面對問題的實際及解決方式，最後則嘗試從傳播擴散的角度，說明張壽林等類學者具有學術貢獻的理論依據，以及該理論可以再延伸的研究方向。

進入討論之前，有必要針對下文闡說的基本觀點稍作說明，也就是學術菁英與學術主流關係的問題。本文視學術菁英與學術主流合一的視角，實際上僅針對類似

* 楊晉龍，本所副研究員。

¹ 參見各期《中國文哲研究集刊》附錄的〈中國文哲研究所出版品目錄〉。

² 彭小妍主編：《楊逵全集》（臺北：國立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籌備處，1998-2001年）。

³ 李明輝、黃俊傑、黎漢基合編：《李春生著作集》（臺北：南天出版社，2004年）。

五四時代的當代學術菁英有效，並非對所有時代的學術菁英有效，尤其對那類後代追認的學術菁英更是完全無效。主要是學術菁英的認定涉及時間性與空間性的問題，例如現代學者大致都會同意王充 (27-107) 是漢代的學術菁英，然而實際上在東漢人的眼中王充是否為學術菁英，雖然還有可以斟酌的餘地，但王充的學術觀點在漢代絕對不是主流倒是可以確定，王充實際上是後代人「追認的學術菁英」，而非他生存時代的「當代的學術菁英」。五四時代的學術菁英大致上沒有這類問題，因為他們在當代就是許多人公認的學術菁英，同時他們的學術觀點也是當時最受矚目的新觀點，雖然不是唯一的學術主流，但確實是當代重要的學術思想，問題只在流行地區的廣狹，滲透擴散程度的深淺而已，這和王充等一類學者的狀況自然大大不同。

二、《張壽林著作集》等的編纂及其經學史意義

注意到張壽林這類非學術界知名的冷門人物的原因，主要是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經學文獻方向的研究團隊，在進行個人與群體等等諸項研究計畫的過程中，大家幾乎都曾發現清末民初以來的學術人物，在相關書籍與研究成果中，出現的永遠都是那幾位知名的人物，好像當時整個中國廣大地區四億六千萬群眾的學術與教育行動，就只有這幾個人活動一般；又好像整個社會思想觀點的改變，就像那類支持五四主流學者書寫的相關書籍或研究成果上說的那樣，就是這幾個人登高一呼，全中國隨即在一夕之間完全改變，從實際狀況來看，這自然不會是個歷史事實。於是為了更確實地了解大陸民國時期的經學狀況，乃由林慶彰先生 (1948-) 與蔣秋華學長 (1956-) 領銜，申請一個自民國九十六年開始執行，連續四年的「民國時期 (1912-1949) 經學研究計畫」。這個計畫設計的本意，除了要探討一般熟知的著名學者，是否還有其他未被發掘的學術價值與影響之外，同時也企圖能挖掘出具有學術史意義而被遺忘的學者，開發其學術的表現及其表現在學術上的價值。深化著名學者的研究意義容易明白，至於挖掘幾乎已被遺忘學者的意義，則根據研究計畫之初設想的用意，大致有三：一則發潛德之幽光，再則引發更全面性的研究，三則提供學界更精確的學術史狀況。民國以來那類幾乎已經快被學界遺忘甚至已經被遺忘的學者，諸如：龔向農 (1876-1941)、張壽林、李源澄 (1909-1958) 等等，即在前述研究的意義與要求下受到注意。

考察張壽林等這類非主流學者的學術觀點，可以發現他們在學術上的重要主

張，大多是依附在某些大學者光環下的發言，缺乏必要的反省批判，因此雖也有不少著作，學術成就也非一無可取，然卻很少受到學界注意。考其所以然者：一則在著名大學者的強大光環照耀下，就像《莊子·逍遙遊》所說「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那樣，這類學者的個人光采因此無法盡現。再則民國以來學術研究環境產生的變化，使得研究者注視的焦點都在著名學者身上，類似披沙揀金研究張壽林等這類次要學者，由於花費的時間甚多，獲得的學術回饋太少，學者居於投資報酬率考慮，當然無人願意染指。三則更由於研究者少，或甚至無人研究，論著不僅散亂且都以素材形態存世，研究成果既無人收集，學術貢獻與價值當然也就無人理會。既然缺乏學術的歸納與價值的分辨，學術史或教科書等提供學術訊息的載體，自然也就不可能加以記述，導致雖相隔不到幾十年，但學界幾乎都已經快遺忘其存在，連其人的事蹟，論著的狀況，都已無法蒐羅齊全。林慶彰先生與蔣秋華學長等有感於此，同時為了有效達成計畫目標，於是或親自尋找收集、或委請學界朋友蒐羅，並組織研究生與研究助理進行初步的整理、打字、點校，最後再由兩人檢證與修正，終於完成《龔向農著作集》、《張壽林著作集》與《李源澄著作集》……等等的蒐羅與整理，除已經出版的《李源澄著作集》外⁴，其他諸書亦陸續進入出版作業之中。

張壽林這類缺乏醒目學術創見的學者，相對於受到學界特別注目的學術寵兒，諸如：王國維 (1877-1927)、胡適 (1891-1962)、顧頡剛 (1893-1980)、朱自清 (1898-1948)、聞一多 (1899-1946)……等等「主流學者」或「一線學者」，大致可統稱之為「二線學者」或「次要學者」。考察這類二線學者的學術共性，由於在學術上缺乏「創造性」的發明，並沒有什麼特別值得強調的學術創見，在學術創新的意義與價值上確實缺乏論述的必要，這也就是未能受到學術史等一類書籍作者青睞的主要原因。但學術史一類書籍未加論列，並不表示這類學者毫無學術上的價值，只因為他們的價值不是一般學術史作者或研究者需要的價值而已。實際上這類學者的價值本不在學術上的創新，而是在對學術創新的接受與傳播；就是針對一線學者們在學術上的「新觀點、新方法、新方向、新價值」等創造性意見的承襲發揚和傳播擴散；這是一種長期以來被學術界忽略，然而卻有相當重要價值的學術貢獻，也就是學術教育傳播上的貢獻。這樣說的理由，主要在於任何學術的發展，必然都脫

⁴ 林慶彰、蔣秋華主編：《李源澄著作集》（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8年）。

離不了「創新解釋」的「詮解」、「傳播流行」的「傳習」和「實踐應用」的「致用」等三個最主要的層面。現在一般學術史或研究者幾乎都以「詮解」的創新與貢獻為「唯一」的價值標準，並未能照顧到「傳習」與「致用」等兩個層面的價值與貢獻，因此未能符合這種唯一標準者當然也就無法獲得其青睞了。不過此種單一偏頗的「三缺二」價值標準，實則僅能見學術的單一而非全面，根據這個理由也就能了解張壽林等一類學者的價值與貢獻所在了。何況人文學的終極關懷應該是「致用」，致用對象的極大化自是全體群眾的接受與實踐，這也就是經學家最常強調的所謂「經世致用」的實質內涵，任何後世認定的所謂菁英學者的學術創見，就其學術本質的要求言，原就不應該永遠都僅是少數菁英分子的專屬品，必須要能落實到眾多群眾中，成為群眾實踐的對象或根據，如此纔能真正實現人文學的意義與價值。這個從菁英分子的專屬用品變成為大眾普遍用品的過程，不論其他相關因素有多少，但其中需要經由時間進程而擴充到更廣大空間的傳播擴散歷程，則是絕對不能少的因素。換言之，菁英學者的創見必然要通過時間進程，纔能逐漸擴散滲透到更廣大的空間，以追求其最終落實到多數群眾而被接受實踐，並成為多數群眾普遍的陳見或固定的意識形態，這樣纔能算是真正達成人文學的學術創新的意義與價值的要求。張壽林等二線學者就是在這個傳播擴散滲透歷程中，發生積極有效的學術功能，這也就是他們在學術上的貢獻與價值。

就經學文獻方向研究團隊最初設計「民國時期經學研究計畫」時的基本認知而論，當初原就認定五四新文化的主流學術人物，對傳統文化的批判與改造，不僅具有非常重大的歷史意義與價值，並且確實對後世造成深遠的影響。不過除了這個一般性的認知之外，同時還思考到新文化主流學者這類批判性甚強的言論，在提出之初對當代多數長期接受傳統中國文化薰陶者的衝擊，其力道之大當該有甚多現代人難以想像的沉重；這些言論出現後，恐怕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只會被歸為「大逆不道」、「妖言惑眾」與「好奇追新」等一類特殊觀點，絕對很難馬上就被固有文化傳統長期複製制約，因而形成的濃厚「慣習」(habitus)⁵，或既存的「典範」

⁵ 「慣習」又譯作「習性」，高宣揚譯作「生存心態」，這是法國社會學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用詞。見高宣揚：〈論布爾迪厄的「生存心態」概念〉及〈再論布爾迪厄的「生存心態」概念〉，《思與言》第29卷第3、4期(1991年9月、12月)，頁21-26、頁295-304。另外戴維·斯沃茨(David Swartz)著，陶東風譯：《文化與權力：布爾迪厄的社會學》(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6年)第五章〈習性：關於行為的文化理論〉的解說較詳細。

(paradigm) 等⁶，無形控制的社會與學術社群接受。新觀念、新思想的落實，必然存在一個時間意義的「接受歷程」，二線學者就在這個使主流學者學術創見，從專屬「獨特性」轉成「普遍性」共識的接受歷程中，提供了學術傳播與教育的助力，最終使得主流學者的觀念獲得一種群眾積極支持與贊成，甚至還努力將自己融入這個「占優勢的權力結構之中的各種價值、理想、目標等」之內的狀況。群眾與這些新觀念之間，因而就自動形成一種類似支配與從屬的關係。主流學者於是帶著新思想與學術新觀念，理所當然地成為高居於認同群眾之上的「霸權」(hegemony)⁷，於是原本屬於創見的特殊觀點，乃變成為一般群眾理所當然接受與討論的共識性俗見，當菁英主流學者的「創見」成為一般性「俗見」之時，同時也就是該學術「霸權」地位確立之日。

菁英創見變成一般共識俗見的過程，對經學研究者具有某些參考的價值，因此有必要再進一步地分析說明。首先就一般社會的正常運作而言，任何新出現的事物，尤其新的思想概念，都有可能因為與既存事物或思想觀點的不諧和，導致多數人的「不知」或「無知」，一般社會成員對自己「不知」或「無知」的事物，必然會因為「自我防衛機制」的作用而產生恐懼感，正常狀況下，不免就會有或者不予理會，或者出現莫名排斥感的狀況，很難馬上接受。故而新事物與新觀點剛出現時，大致上都只能處於比較邊緣的位置，除非有政治力量的強制性介入，否則這類「新事物」從出現到接受，必然需要經過一個必要的時間過程，或者如李明輝先生所言的「脈絡化」過程⁸，纔有可能被社會多數群眾接受。這個必要過程的變化狀況，可以藉用韋伯(Max Weber, 1864-1920)所謂「理想型」(ideal-type)的概念⁹，用線性的方式呈現為：

創新觀念的出現→居學術邊緣地位→主流學者向外傳播→社會的質疑大於接

⁶ 「典範」或譯作「範式」，此參考托馬斯·庫恩(Thomas Samuel Kuhn)著，金吾倫、胡新和譯：《科學革命的結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之意，尤其是第二章與第五章。

⁷ 此參考約翰·斯道雷(John Storey)著，徐德林譯：《斯道雷：記憶與欲望的耦合——英國文化研究中的文化與權力》(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年)，頁2所言。

⁸ 參見李明輝：〈中西比較哲學的方法論省思〉，《東亞文明研究通訊》第3期(2004年4月)，頁31。李先生原在討論跨文化的轉換過程，因為兩者都具有「由新入舊」的「轉換」內涵，故藉以討論新思想觀點的轉換過程。

⁹ 「理想型」之義，我以為林毓生先生之解說最為清楚，見王元化、林毓生：〈王元化、林毓生對話錄〉，《跨文化對話》第24輯(2009年2月)，頁82。

受→主流學者根據回饋而調整內容與策略→主流學者與二線學者共同強力傳播→社會的接受逐漸大於質疑→創新觀點與既存觀點並立→創新觀點成爲一般觀點或學術主流。

這個過程中最主要的關鍵就在傳播、回饋與調整等三項，但回饋與調整實際上是立基在傳播的結果上，傳播因此纔是其中最主要與最重要的活動。但傳播若僅靠少數著名學者發聲，發揮的功能終究還是相當有限，必須結合「粉絲型」(fancy)的二線學者們，努力發揚、共同傳播，使得擴散的層面與區域增大，因而獲得最大的傳布效果。菁英學者的創見在學術界中成長定位的歷程，就如同一棵樹木在叢林中的成長發展過程；當樹木發芽新生之後，主幹的健康茁壯固然重要，但若無扶疏的枝葉，則主幹不僅無法與其他樹木競爭，並且也會很快因為無法抵擋其他樹木的競爭侵擾而枯萎。創新的學術觀念、思潮或學派，要能從邊緣而走入主流，考其學術地位所以轉變之故，除時代或歷史的相關因素之外，創造者的功勞固然不能抹滅，但傳播者的功能也絕非可有可無。創造者與傳播者的關係，或者可以藉用唐代曹松(828?-903)〈己亥歲〉詩「澤國江山入戰圖，生民何計樂樵蘇；憑君莫話封侯事，一將功成萬骨枯」之言¹⁰，所謂「一將功成萬骨枯」的意思說明。成名或是著名的將領背後，必然有無數就歷史而言，無名無姓士兵的鮮血與生命的支撐；這個血腥的事實，轉移到學術發展的比喻來說，就是指無論任何一個新學術思潮的形成與風行，因而成爲某歷史時段的學術主流，絕對不會僅僅是那幾位有如成功將領般的創造者即可完成；學術新觀念、新思潮或學派取得學術地位的過程中，必然還包括有非常多「無名英雄」的心血在內，但由於大家習慣於把眼光放在成名學者身上，習慣於只見「創新解釋」詮解者的價值與貢獻，忽略「傳播流衍」傳習者和「實踐應用」致用者的價值與貢獻，無名英雄式的學者當然也就無法受到學界應有的重視。了解此點就能體會當初思考「民國時期經學研究計畫」之際，何以會有挖掘二線學者「發潛德之幽光」的設計之用意。找出這些參與其內而助成新學術潮流或學派的無名英雄們，不僅讓大家了解他們在學術傳播上的貢獻，同時還希望經由披沙揀金的分析研究功夫，挖掘這些類似無名英雄的二線學者們對一線學者的學術創新觀點，是否存在有深化、補充、擴充、糾正或誤解等等的實際表現，進而補充或糾正現存經學史或學術史內容上的不足。

¹⁰ [清]曹寅等編：《御定全唐詩》（網路版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717，頁4。

挖掘研究張壽林等一類學者的表現，所以在糾補經學史或相關研究上具有實質意義，主要是長期以來經學史及其相關論著，受限於「習慣使人思考與行為懶惰」的影響，因而評價的重點，都僅僅固守在那類具有學術「創新解釋」表現的學者身上，呈現的內容基本上不僅是菁英意義下的學術史，同時也是文獻學意義下的經學史，此種菁英文獻學式的經學史，偏重於菁英主流學者之經學專著的研究，以及「歷時性」與「共時性」意義下學術創新發現的分析探討。這對經學特殊面的了解固然沒有問題，但以特殊表現當作整個時代的一般表現，以偏概全「三缺二」的闕漏自不待言。仔細考察菁英文獻學式經學史的研究方式，就會發現是一種「以後史規定前史」的「逆推式」思考下的研究，此種研究方式缺乏對歷史線性時間發展，必然存有前後次序基本原則應有的尊重，因而不免加入了許多「以今代古」的現代式想像，混淆了歷史實際呈現的狀況。這類過度重視成名菁英學者的研究，在逆推式思考作用之下，於是以「後見之明」的既成歷史事實，當作「不言自明」的前提，然後再根據已經確定的歷史事實，逆推而「規定」當時歷史的發展，「必然」且「應該」朝著已經早有答案的固定方向前進，這種研究思考模式，說穿了不過是一種變形的「主題先行」、「結論已定」或「答案固定」的研究而已。同時這種研究僅會針對那些一直被提起、一直被推崇的成名人物進行再研究或再誇大，於是不斷地挖深、吹噓既定成名人物創造性的價值與意義，以及影響力量的強大不可擋，目的則是希望建構完成只要這些成名主流學者登高一呼，學術世界馬上就改變的假象，這種過度誇大成名學者能量的研究方式，當然有檢討改善的必要。「民國時期經學研究計畫」設計加入二線學者表現與作用的研究設想，正是基於糾補改善現行經學史或相關研究上闕漏的需要而誕生，此種重視二線學者學術傳播價值與貢獻的研究方式，既沒有要否定更沒有要取代以菁英主流學者為主的研究的企圖，反而是以菁英主流學者研究為基礎的補充性研究，重點是立足於菁英主流學者的研究上，因而更完滿的表現經學史的實際內容。此種結合「詮解」、「傳習」，甚至「致用」的研究方式，相對於以經學專著和創新觀點為主的菁英文獻學式的研究方式，不僅較為平實且較有可能概括全面性的學術表現，姑且稱之為傳播式經學史研究，傳播式經學史就是在確實了解逆推式菁英文獻學式經學史不足的前提下，希望可以有效減低錯誤結論的出現，以及比較確實彰顯無名英雄式二線學者們的貢獻，以便能更精確說明經學史事實的一種研究思考。

將無名英雄式的二線學者們納入研究主要對象的傳播式經學史，研究方式是順

著時間的線性次序思考，首先必須設想在一無所知的前提下，公平地尋找事件發展的種種可能性¹¹，所以已經出現而定格的歷史，不過是眾多發展可能性中的一種，絕對不會是「唯一」或「必然」的發展方向。這種研究模式首先必須拋棄以今人需要而要求歷史發展的「以今律史」的不當態度，但卻也不抹煞成名英雄一類主流學者確實改變學術世界的歷史既存事實，只不過不相信主流學者登高一呼學術界就馬上改變的神話而已。執行此種研究方式者，承認學術界的改變必然有一個時間歷程，同時認定在這個過程中，不僅創新的學術非常重要，使新學術訊息盡量傳播，並逐漸在學界與社會擴散而滲透也同樣重要，必須經過這樣的歷程，纔會有被了解、誤解、接受、反對或不反對等種種不同的回饋反應，最後方有可能成為整個社會多數人接受的學術主流或重要思潮。這個經由傳播而確定學術地位的過程，絕非短期內可以落實完成，更非理所當然的自然形成，二線學者們就是在這個傳播接受而形成固定認知的過程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由於二線學者們缺乏固定學術地位的特性，比較不可能產生「以後定前」的差誤，傳播式經學史在研究這類二線學者們的意義與貢獻之際，因此乃能以一種順著歷史「沒有規律」與「沒有目的」，自由發展基本原則的正常思考方式研究，認定歷史上所有創新的事物，包括新的觀念與學術在內，從出現到被接受，直到最後成為主流或重要思潮，或者消失不見，絕非某種規律下必然的結果。因此除了要能在相同學術競爭中獲得勝利外，同時還需要許多無名英雄式二線學者們的協助傳播，纔有可能達成對社會與學界滲透的目的與功能。例如因朱熹(1130-1200)而形成的程朱學派，其由學術邊緣成為主流學術的過程，就是個典型的案例。考察朱熹學術所以能在元代以後，逐漸成為學術主流思潮，其實是經由幾百位具有中低階層官位官員努力傳播的結果¹²，這些官員絕大多數是學術史上毫無蹤影的二、三線的無名學者。可知學術創見必須藉助諸多無名二線學者們傳播滲透的協助，纔有可能達成擴散到更廣大空間而被更多人接受實踐的終極目的。

觀察參與「民國時期經學研究計畫」學者發表的相關論文，卻發現多數論文表

¹¹ 這個觀點主要參考美國倫理學家羅爾斯(John Rawls)《正義論》第三章〈原初狀態〉推理假設的「無知之幕」之說法而成。見羅爾斯著，黃丘陵譯：《正義論》(臺北：結構群文化事業公司，1990年)，頁133-138。

¹² 參見田浩(Hoyt Cleveland Tillman)：《朱熹的思維世界》(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9年增訂版)一書相關的統計分析。

現的內容，還是依循著闡發學術創新價值的菁英文獻學的思考方向進行研究；就是依然使用那類研究被後代定位為主流學者的研究方式研究二線學者們，研究者幾乎都有一種突顯或重新發現二線學者們學術創發性貢獻的「焦慮」，於是過分拔高其學術價值的問題也就難免產生，這種結果不僅顯現研究者沒有能夠真正理解與闡發二線學者的學術史價值，同時也無法真正突顯這類學者實際的學術貢獻，反而暴露了這類學者們在學術創發上的不足或缺點。在此種發現創新「焦慮」下研究二線學者們，很容易在研究過程中不自覺地將二線學者孤立在意義的學術環境之外，因而在缺乏「歷時性」與「共時性」學術實況的有效對比情況下，或將二線學者們承襲自主流學者的觀點，或將二線學者們並不太重要且可能缺乏創意的概念與意見，誤當成其一己的重要學術發現。這種研究結果僅是達到當初計畫設計時的一半目的而已，並沒有落實該研究計畫的真正精神。發生此種差誤的原因，主要在於發表者缺乏從傳播學角度進行研究的基本認知，因此無法確實了解要研究這類無名英雄式二線學者們的學術價值與貢獻，不僅在研究方式上必須與研究成名的菁英主流學者不同，同時二線學者與主流學者的學術價值與貢獻層次也不同，還有學術價值與貢獻層次雖不同，卻必須相輔纔能相成，纔足以構成實際經學史表現的基本認知。就是說缺乏了解主流學者的學術價值與貢獻，乃在學術誕生意義上的創新發明；二線學者們的學術價值與貢獻，則在於落實學術新發現或新觀念的傳播擴散上。至於二線學者們是否有學術上的創新發明並不特別重要，最重要的是如何有效轉化學術新知識、新觀念，使其成為學界或社會的一般性共識，甚至成為多數群眾不自覺表現或認知的「刻板印象」。因為學術理念若只在少數學者之間傳播，必然導致一般群眾與多數學者，或者根本無從得知，或者認為與自己無關，則學術創新的意義與價值，恐怕很難說已經充分達成。寫作此段省思的意義，就在於希望透過此番論證分析，使得參與「民國時期經學研究計畫」的學者，可以更深入了解計畫原初的重心所在，並提供一種有效落實該計畫核心精神的研究方法。

三、《張壽林著作集》整理點校的問題與因應

編輯《張壽林著作集》這一類著作有關的資料蒐集過程、整理及參與者狀況等等的訊息，可以參考林慶彰先生在《李源澄著作集》和《張壽林著作集（古典文學論著）》兩處〈編者序〉中所言。張壽林的學術表現，則可參考陳文采（1962-）之

文的簡略論述¹³，至於整理此書的學術意義、價值與貢獻，自不好自吹自擂地自我宣揚，因此有待同行的評判賞鑑。不過張壽林書寫的提要稿中，包括有韓國（新羅、高麗、朝鮮）學者和李朝官方編纂的書籍九十三部，還有一些屬於《四庫全書》未收錄的二線學者之著作，以及《四庫全書》以後出現的著作，這些書籍有很大一部分在臺灣並無法獲見，甚至是否還存在天壤間都是個疑問。雖然其帶有書評性質的提要稿內容，還有許多需要再斟酌的觀點與意見，不過就其所提供的文獻訊息而論，對相關的研究者，應該頗有正面的助益。由於在整理出版這些二線學者著作的過程中，筆者無意間加入《張壽林著作集》點校與校訂的工作，因而得以既是參與者也是旁觀者的角色，觀察到一些以為還有意義的細微事件，或者值得提出來與有興趣者分享。

首先蒐集資料之難，實非一般局外人所能體會，林先生對資料蒐集之事，雖數言帶過，但實際上其過程卻是困難重重，若無林先生精深的目錄學知識、鍥而不捨的精神，以及在兩岸學界累積三十年建立的廣大人脈¹⁴，根本就無法完成。因為張壽林並非知名人物，固然參與過《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的編纂，但長期以來並未受到重視，如筆者在民國八十一年開始撰寫博士論文時，因為參考了〈清代詩經著述考略〉，當時就曾想再進一步了解其人，但卻找不到相關資料，由此可知光編纂其研究成果的論著目錄，就不是一件容易做得好的事情。論著目錄若無法確知，就無法收集編纂著作集。林先生因而先指導學生收集資料編纂目錄，然後再按目錄蒐尋論著文獻，一步步地達成目標。事實上光編成張壽林的論著目錄，就已經是對學界的一大貢獻了，何況其論著散落四方，加上戰禍連綿不斷的影響，大陸「文化大革命」時期滅絕式的文化摧殘，使得許多文獻或者已經佚失，或者深埋於書堆中，或者深藏於私人手中，收齊已經非常困難，收集後還要找到合適且願意承擔責任的整理者，那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其事真是千頭萬緒，過程之艱難，真是一言

¹³ 陳文采：〈張壽林詩經學研究〉，林慶彰、蔣秋華主編：《張壽林著作集（古典文學論著）》（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9年），下冊，頁1605-1658。

¹⁴ 林慶彰先生的學術及人脈等相關的評論與訊息，有興趣者可參考陳恆嵩、馮曉庭編：《經學研究三十年：林慶彰教授學術評論集》（臺北：樂學書局，2010年）收錄之文章。筆者發表於《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的〈千里尋跡安徽行：乾嘉學術研究赴大陸考察報告〉（2000年6月）、〈重返揚州南京論學考察記〉（2000年9月）、〈世紀之交廣州學術考察記〉（2001年6月）等學術遊記之文，亦可提供部分資訊。

難盡。

其次整理張壽林這類幾乎已快被遺忘的非主流學者的論著，相對於整理知名學者的論著，花費的時間不僅更多，學界回饋的收穫更是相對的微少。如果把相同的時間用在主流學者論著的整理，獲得的學術回饋不知要多上幾倍，就投資報酬回饋的角度看，實在太不上算。然而長期懷抱著「帕金森症」在身的林先生，卻寧可把時間「浪費」在此種「發潛德之幽光」，以及提供學界難得文獻資料的工作上；不願將寶貴的時間，花費在「錦上添花」且可以增加自己學術光環的效率工作上。因為林先生認為主流知名學者的論著，既容易確認也容易尋找，早晚一定會有人整理，反而像張壽林這類對學術傳播有大貢獻，然而又缺乏重要學術創見的學者，很難獲得一般學者的青睞，因此更應該花時間將其整理出版。林先生此種學術心態上的認知與胸襟，恐非一般汲汲於成績與成果的學者所能了解。

其三則〈編輯體例〉第六條提及查對張壽林著作引文之事，看起來最簡單，但執行起來其實有其困難，同時也是整理花費最多時間之事：一是張壽林引述的許多書，有些在臺灣並無收藏，甚至提供的書名原本就錯誤，因而無法查對，如《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的地志類、韓國（新羅、高麗、朝鮮）學者的著作，以及清末民初出版的著作，就有甚多臺灣沒有收藏的書籍。二是許多書籍都有不同的版本，因此即使發現訛誤，在無法確知張壽林使用何種版本的情況下，只能暫時保留原貌。三是張壽林論著中某些文句段落錯亂之處，有些可以根據上下文，有些可以根據他處之文，判斷其為排印錯誤，但有些則無法判斷與糾正，因此也只能暫時保持原貌。四是張壽林引文經常有刪節的情形，甚至將引文融入自己的行文，有些刪節之後，實與引文之原意相悖，刪正則與張壽林原意不符，不刪正則與原作者之義不符，這也是整理上比較麻煩之處。

其四則張壽林對某些學術的判斷或評價，沾染太多民國初年學界那種自我感覺良好的「反傳統」與「自以為是」的習氣，發言不免會帶上許多過於偏頗主觀的盛氣¹⁵。例如：過度推崇不知何謂的「民間」或「群眾」、過度推崇「純文學」的價

¹⁵ 例如論及孔子是否刪《詩》的問題，只舉對自己主張有利的資料，同時也都往自己有利的方向解說，完全不提相反不利的資料。見林慶彰、蔣秋華主編：《張壽林著作集（古典文學論著）》，上冊，頁 19-23、頁 51-61、頁 99-108 等處。有關孔子刪《詩》議題討論的歷史發展問題，有興趣者可以參考筆者 2011 年 6 月 4 日發表於臺北市立教育大學主辦的「2011 年儒學與語文學術研討會」中的〈詩經學之刪詩問題述評〉一文之討論。

值、完全藐視《詩經》的「詩教」功能、藐視學術傳播與教育的功能、藐視資料收集的學術價值等等，《續修四庫提要稿》中的許多判斷評價，因此都頗有值得再商榷之處。從學術史的角度論，張壽林這種偏頗表現，固然有力地呈顯了民國時期主流學者的觀點，下貫到一般非主流學者形成學風的情況，很可以作為學術史的重要原始資料，不過卻也使得張壽林著作的學術價值，因之而大大減損。整體而言，張壽林當該是歸屬於那類「隨風飄蕩」的跟隨時代主流學術的接受者與傳播者，並非時代「搨風點火」的事件或觀點的生產者或製造者。這可以從他對胡適與顧頡剛的詩經學觀點，毫無保留的接受與讚美而得知¹⁶。此種順著主流學者觀點的範圍，亦步亦趨地朝著相同方向思考，缺乏批判與其他可能性反省的研究方式，最多也只能成為該主流學者的「依附者」而已。這當該就是張壽林無法成為具有學術創見主流學者地位的重要原因，這或者也可以提供給某些喜歡「趕時髦」或「追流行」的研究者參考。

整理標校張壽林所寫《續修四庫提要稿》中的提要時，曾經與早期日本學者平岡武夫(1909-1995)提供出版的《續修四庫全書提要》稿件¹⁷，以及大陸中國科學院羅琳教授等整理的《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經部)》相參較¹⁸。除其中部分提要撰寫者標列的名字不同外，還發現臺灣出版的《續修四庫全書提要》中甚多張壽林撰寫的提要，都漏列其名。大致出現的情形如下：(一)首先與《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經部)》比對，發現的狀況是：清朝沈豫《春秋左傳伏注》(頁700)¹⁹、隋代劉炫《春秋規過》(頁739)、清朝黃中《詩傳蒙求分韻》(頁1381)、朝鮮李朝官員編纂的《樂學軌範》(頁666)等書，提要稿均作張壽林撰。《影北宋鈔本毛詩》(頁303)、清朝莊有可《毛詩說》(頁366)、清朝張玉綸《毛詩多識》(頁401)等提要稿的作者，則題作「倫明」而非張壽林。魏朝糜信《春秋穀梁傳注》書名作《春秋穀梁傳糜氏注》(頁729)，提要稿作者題作「楊鍾羲」而非張壽林；朝鮮朴世采《春秋補編》(頁810)和佚名《春秋人物》(頁811)，

¹⁶ 參見林慶彰、蔣秋華主編：《張壽林著作集(古典文學論著)》，上冊，頁7、頁53等。

¹⁷ 王雲五主持：《續修四庫全書提要》(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2年)。有關此分資料的來歷，參見張寶三：〈狩野直喜與《續修四庫全書提要》之關係〉，《唐代經學及日本近代京都學派中國學研究論集》(臺北：里仁書局，1998年)，頁83-134。

¹⁸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整理：《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經部)》(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

¹⁹ 「頁700」，係《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經部)》的總頁碼，下同。

提要稿的作者均題作「劉白村」而非張壽林。朝鮮朴世采《三禮三卷附改葬儀一卷》書名作《三禮儀三卷附改葬儀一卷》（頁 635）、清朝魏彥《重刊宋紹熙春秋公羊傳注附音本校記》書名作《重刊宋紹熙春秋公羊傳注附音校記》（頁 722）、清朝姚際恆《春秋通論十五卷卷前一卷》書名作《春秋通論十五卷卷首一卷》（頁 750）、清朝趙儀吉《春秋箋例三十卷卷首一卷》書名作《春秋箋例三十卷首一卷》（頁 397）等，這些都是與《張壽林著作集》原稿參差之處。（二）接著再與臺灣王雲五(1888-1979)主持的《續修四庫全書提要》第一冊「經部」收錄的提要稿比對，以《詩經》部分為例，發現收錄的馬國翰輯〈毛詩答雜問一卷提要〉（冊 1，頁 345）²⁰、明朝的楊于庭〈詩經主義四卷提要〉（冊 1，頁 363）、姚應仁〈詩述不分卷提要〉（冊 1，頁 363）、鍾惺〈詩評不分卷提要〉（冊 1，頁 364）、何大掄〈詩經主意默雷八卷提要〉（冊 1，頁 366），以及清朝佚名〈韓詩不分卷提要〉（冊 1，頁 559）等六分提要稿，其中除〈韓詩不分卷提要〉作者題「江瀚」外，其他均未題作者之名，事實上這些提要稿的作者，當以張壽林為是。總體而言，《續修四庫全書提要》的資訊較不可靠，同時錯別字也較多，如〈詩經主義四卷提要〉中「其於詩也」，誤作「其於時也」（冊 1，頁 363）之類。這是與該二書稍做比對後的結果。出現這些參差的情況，可能和這些提要稿都是抄錄的手寫稿，或者經過再油印的稿件，因而在抄錄與裝訂過程中出現問題，當然也不排除手民之誤的可能。雖然這方面的問題，在整理過程中大致都已解決，但還是有必要稍做說明而讓讀者了解。另外明朝姚應仁的著作，根據〈提要稿〉引述的姚氏〈自序〉有「名曰述述者」之言推斷，則書名當作《詩述述》較是，而非現題的《詩述》。

最後則某些字形兩歧的文字，張壽林並無固定寫法，整理之際乃加以統一，例如：「臯」字統一作「皋」、「恒」字統一作「恆」、「秘」字統一作「祕」、「台」字統一作「臺」、「菴」字統一作「庵」、「冊」字統一作「册」……等等之類，此在〈編輯體例〉中未能詳說，故附記在此以為讀者參考焉。

²⁰ 「冊 1，頁 345」，係指《續修四庫全書提要》的冊數與頁碼，下同。

四、餘論：傳播式經學史研究的說明及延伸

根據前文的論證說明，可知長期以來學術界接受的經學史，乃是那類專注在菁英主流學者經學論著內容與表現的文獻學式研究下所得。這類僅注意「詮解」創新而遺漏「傳習」與「致用」的研究，其所獲得的結果再如何精當，最多也只能是表現歷史實際狀況「三分之一」的「殘缺」經學史而已，並非符合實際的經學史。真正比較符合歷史事實的經學史，必然是結合主流學者與二線學者們共同鑄鑄形成的經學史。此種落實到實際影響層面的傳播式經學史研究方式的原始構思，主要是借用傳播學中「二級傳播論」(theory of two-step flow) 及「創新和訊息擴散」等概念的發揮²¹。一般而言，傳播指的是一種傳送及接收訊息的過程，是主事者（傳者或發動者）把訊息編碼（符號化或文字化）後，經過傳送及解碼（詮釋）的程序，將預設傳送的事物有效並完整地送達接收者（受眾）之處。在這個過程中最重視的問題，包括：發動者（何人：who）、內容（說什麼：says what）、媒介（渠道：in which channel）、接受者（受眾：to whom）和效果（with what effect）等傳播學上所謂「五 W」的內容²²。將這個概念移用到學術創見全面性落實的過程，則主流學者就是（直接）「發動者」，創新的學術觀念是「內容」，二線學者是「媒介」（間接發動者），學界與社會群眾是「受眾」，創新學術變成為學界主流是「效果」。就學術傳播擴散的研究而論，關心的重點在主流學者或者親自傳布、或者透過二線學者傳布，因而將訊息傳送到更多群眾與更大空間的歷程，因此也就具有傳播學的意義。根據此理論的設定，經學史上類似張壽林等一類二線學者，既非直接創新學術的「主事者」，同時也非具有全國性知名度的主流學者，就其表現而言，大約可

²¹ 傳播式經學史研究方法的內容與概念，曾經參考戴元光：《傳播學研究理論與方法》（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3年）及臧海群、張晨陽：《受眾學說：多維學術視野的關照與啟迪》（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7年）兩書之論；下文的引述與解說亦多來自二書，不敢掠美，謹此說明並致謝。「二級傳播論」與「創新和訊息擴散」之意涵，參見《傳播學研究理論與方法》，頁34-48相關論說。

²² 相關觀點源自利貝卡·魯賓(Rebecca B. Rubin)等著，黃曉蘭等譯：《傳播研究方法：策略與資料來源》（北京：華夏出版社，2000年），頁5-9及李永健編著：《傳播研究方法》（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9年），頁6-7等兩處。

與傳播學「二級傳播論」中所謂地域性「意見領袖」(opinion leader)的地位相當，主流學者則大約可與具有全國性或小範圍的意見領袖相當。地域性或小範圍的意見領袖，其地位與影響力，固然不能與具有高知名度的全國性或小範圍的意見領袖相比，但由於其與「受眾」之間較為直接密切的關係，故而在某些小地區範圍內，較之全國性意見領袖更能產生傳播的效果。這主要是人類在採納接受某種新觀念之際，大致都有一個學習（知曉）、決定（選擇）和行為（落實）的分段性「決策過程」(decision-making process)，這個過程中「人際關係」的傳播效能最高。從學術傳播角度來看，全國性意見領袖性質的主流學者固然知名度高，但卻無法分身到各處，對學習者來說必然是生疏而缺乏親密關係，地域性的二線學者們則能夠直接與學習者接觸，密切與直接的人際關係，自然影響到學習者「決定」與「行為」的決心，因而產生較主流學者更大影響力的傳播效應，這是就「人」的角度立論。若改從「學」的角度來說，則主流學者創新的學術觀點，或者較為精深，或者學術性較高，一般學者或群眾因而很難直接理解，透過二線學者們或者提供更多的證據，或者再進一步地發揮與解說，經過這個「傳送及解碼」的再製過程，自然就更容易被學習者接納選擇，因而達到落實並擴散的傳播效果。

民國時期五四新文化人物的主張，固然由於當時傳播媒介的發達，加快了傳播的效應，因此能在比較短的時間之內，產生比較大的傳播影響。但爭議其實一直存在，新文化人物對自己提出的主張，依然不斷地自我修正與改變，新文化運動主流學者強力推動的那些新觀念，出現之初，最多也僅能與其他傳統學者「分庭抗禮」而已，並沒有能夠真正成為當時學界唯一的主流思潮。現在許多人之所以會誤以為胡適等新文化主流學者登高一呼，顧頡剛等附和者編纂出版《古史辨》之後，馬上就風靡全中國，於是成為當時唯一的主流學術；其實這是後來中國學術界的發言權，幾乎都在胡適等相同理念者的控制之下，因此在有意無意之間刻意誇大的結果，歷史的事實並非如此。胡適等的影響固然很大，但影響的區域其實相當有限，大約以沿海地區的少數都會城市為主，胡適等的影響力所以能夠擴充到更廣大地區的功臣，實際上就是那類認同並承襲發揮胡適等觀點，類似張壽林等地域性與解說性二線學者們的努力，纔使得新文化運動主流學者們想要傳播的新思想與新學術觀念，逐漸擴散到整個中國地區。新文化運動新觀念的落實，實際上是胡適等主流學者與張壽林等二線學者們合作努力之下共同完成的結果。這也就是傳播式經學史研究方式下獲得的最終結論，同時也就是要花費心力整理點校《張壽林著作集》等一

類二線學者論著的主要原因。

再者這種藉由傳播擴散概念而形成，並以分析探討二線學者們功能與貢獻為主要的研究方式，除可以比較有效顯示及糾補經學史相關論著內容上，「三缺二」不全的「殘破」困境外，同時就其研究的意圖與目的而論，還可以用以分析一般教育過程中，現場教師們在傳播新學術與新觀念上的功能與貢獻的價值。就是在這個研究思考的意義之下，可以將教學現場的教師們，視同具有地域性意見領袖地位的間接傳播者，因此在新學術與新觀念傳播上的貢獻與功能，實與二線學者們的功能與貢獻相當，這是本文或者可以提供學界參考的另一種可能。